

試論国民經济高速度發展的波浪式 与持續躍進

尹世杰 刘光杰

建設速度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因为这是保證社会主义制度最終战胜資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經济制度之所以能够确立并且巩固的发展，就在于社会主义能够以資本主义所不可設想，不可比拟的高速度发展自己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經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已經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設实践的經驗所完全証明了。苏联从1918年到1957年这四十年內，如果包括战争年份在內，工业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为10.1%，而美国不过为3.2%，英国为1.9%，法国为3%；如果不包括战争年份和經济恢复时期在內，苏联工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6.2%，美国仅为2.9%，英国为3.3%，法国为2.6%。从1958年的情况来看就更为明显，苏联的工业生产1958年比1957年增长10%，而美国比1957年下降了6.5%，英国下降了1%。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同一时期，美国只增长2.8%，英国增长3.9%。1958年我国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工业生产增长66%，农业生产增长25%。1959年仍然将是一个更好的全面的大跃进。

如果我們把社会主义各国和資本主义各国作为两个体系来考察，它們的工业发展速度就如下表：50年=10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1—1958 每年平均增长
社会主义陣营各国：	119	136	155	175	194	216	234	260	12.8%
資本主义陣营各国：	107	113	120	120	134	140	143	137	4%

从上面材料，我們自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社会主义經济的发展速度远比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速度为高，这表明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个不同經济制度的本質差別，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束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表明了两个不同經济制度的两条根本不同的經济发展路綫。

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設中最根本的問題，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建設的經驗来分析社会主义經济高速度发展的規律性，分析影响高速度发展的諸因素，找出高速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对于我們認識和掌握客观規律，調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情况，来确定不同的經济发展速度，以保證国民經济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发展，無論在理論

上和實踐上都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二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高速度，究竟存在着怎樣的發展趨勢，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高速度發展的趨勢必須是逐年遞增的；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高速度發展的趨勢從生產的絕對量上來看是逐年增長，而從增長的百分比來看則是逐年遞減的。

應該說，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不僅從理論上講是站不腳的，而且從社會主義各國建設的實際情況來看，也是與客觀情況不相符的。

首先，讓我們從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實踐情況出發，來看看高速度發展的趨勢究竟是怎樣的？

下面是蘇聯建國以來工業生產逐年增長速度的資料：（比前一年增長％）

1921年+42.1	1931年+20.0	1946年+17.0 [●]	1956年+11.0
1922年+30.7	1932年+15.0	1947年+22.0	1957年+10.0
1923年+52.9	1933年+ 5.0	1948年+26.0	
1924年+16.4	1934年+19.0	1949年+20.0	
1925年+66.2	1935年+23.0	1950年+23.0	
1926年+43.1	1936年+29.0	1951年+16.0	
1927年+14.4	1937年+11.0	1952年+12.0	
1928年+12.0	1938年+12.0	1953年+12.0	
1929年+20.0	1939年+16.0	1954年+13.0	
1930年+22.0	1940年+12.0	1955年+12.0	

如果我們把上述資料用圖示表列出來，就很容易看出，從1921年到1958年這近47年的時間內，蘇聯工業生產增長的速度（比上一年增長的百分比）既不是逐年遞增，也不是逐年遞減，而是呈波浪起伏狀態，有時增長的幅度大一些，有時增長的幅度就小一些。而且這種波浪式的发展，在有的時期還是大波大浪的形式，例如在經濟恢復時期和工業化初期（1921—1927年），在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年）時期和戰後經濟恢復時期（1946—1950年）波浪也都不小；而在有的時期，這種波浪式的发展又呈現着小波小浪的形式，例如從1952—1958年這一段時期，波浪就比較平穩，略有起伏。

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時間還不太長，但是，就從我國建國十年來工農業生產發展的資料，也表明了高速度發展這一相同的趨勢[●]。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工業：	+36.4	+37.9	+30.3	+30.2	+16.3	+5.57	+28.24	+11.4	+66.2	+25.6
農業：	+17.7	+ 9.4	+15.7	+ 3.1	+ 3.3	+7.7	+ 4.9	+ 3.5	+25.0	+10.0

● 1921—1927年資料見“蘇維埃經濟的發展”一書，學習雜誌社1955年版258頁和362頁。

1928—1957年資料見“蘇聯工業統計學論”轉引自勒·科茲洛夫“論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指標”經濟譯叢，1959年第6期。

● “偉大的十年”國家統計局編，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16頁。

无论从工业或者农业的发展来看，其波浪起伏的趋势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这种波浪式前进的趋势，同资本主义经济那种曲线式的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波浪式前进，并不意味着生产的发展同生产的衰退，生产的增长同生产的下降相交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存在着生产的下降或者生产缩减的情况，增长的幅度显然有时大些，有时小些，但生产的高速度增长总是绝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曲线式的发展则不同，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总是经常为危机所中断，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企业开工不足，倒闭，生产锐减。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就总是在危机式的下降和寒热病式的上升这两种情况的交替过程中来发展的，例如从1953年到1958年，美国工业生产发展速度：1953年增长7.8%，1954年下降6.6%，1955年增长11.2%，1956年增长2.5%，1957年没有增长，1958年又下降了6.5%。

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趋势呢？波浪式发展只是由于人们的主观因素所造成还是有其形成的客观经济基础呢？

我们认为，形成波浪式前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而后者是主要的，决定波浪式发展的具体因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来看。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最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并促进生产的发展的，它保证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就说明了的。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是始终很均衡的，它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生产关系处于量变阶段时，它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比较均衡的，当生产关系处于一个质变时，它就会引起生产力一个质的飞跃。

例如在我国，没收官僚资本的财产，进行土地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些方面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就已经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这些巨大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飞跃发展，但是，对于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在1955年以前我们对小农经济，个体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在这期间，生产关系每一个微小的变革，改造的形式每由低级进到高一级的的发展，必然会对生产发生积极的影响，到1955年冬和1956年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先是农业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继之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质变，毫无疑问，这一变革必然会对生产带来巨大的推动力量，1956年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所掀起的生产高潮，就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由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必须不断的巩固和发展，在这整个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并不是很均衡的。在1958年，继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及1957年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在我国广大农村又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它把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进一步扩大和提高了，并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这就是我国在1958年整个国民经济取得大跃进的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象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却并不是会经常（例如每一年）出现的。

社会主义生产關係是最适合生产力性質，但是，这并不是說两者之間不存在矛盾，不过这种矛盾不帶有對抗的性質，它不需要对生产關係作根本的变革，只要对生产關係中某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作局部的調整，而这种調整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由于对生产關係个别环节的局部調整而給生产所帶來的作用，也并不是各个时期完全相同的。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關係的变革和生产關係个别环节的調整，就帶有不均衡，波浪式發展的性質，因此，它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从而表現出来的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就帶有相同的性質。

其次，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趋势来看。我們知道，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归根結底取决于两个因素：社会劳动耗費量的增加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若从形成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原因来考察，社会劳动耗費量的增加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因为，社会劳动耗費量增加又取决于：劳动時間的长短和劳动力数量的多少。而劳动時間的长短，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在一个长時間它是比較固定的。至于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从一个长时期来考察，它也是比較穩定的。因为，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决定于人口增殖的速度，而人口增殖的速度在各个国家也是比較穩定的。例如苏联最近几年来，工人人数增长的速度比較穩定。1951年增长5.6%，1952年增长3.7%，1953年增长5.7%，1954年增长5.6%，1955年增长3.7%，1956年增长3.5%，1957年增长3.3%，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設初期，一方面要解决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員的就业問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速度就可能大一些，在各个年度之間，劳动力的增长数量，也不是一致的。但从总的来看，从长期发展趋势来考察，劳动消耗量这个因素对形成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并不是絕對的。

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趋势有密切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是一个客觀規律，但是，由于各种經濟因素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并不是逐年递增或者递减，而是波浪式前进的，我們从苏联1929—1957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資料来看：●

1929年+12.9	1935年+13.0	1947年+13.0	1953年+6.7
1930年+ 9.7	1936年+21.4	1948年+15.0	1954年+7.0
1931年+ 7.6	1937年+ 8.9	1949年+13.0	1955年+8.0
1932年+ 2.6	1938年+11.0	1950年+12.0	1956年+7.0
1933年+ 8.7	1939年+16.7	1951年+10.0	1957年+6.8
1934年+10.7		1952年+ 7.0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仅是呈波浪式前进，如果我們把各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資料拿来和上述所引苏联工业生产各年增长速度的資料进行比較，我們还会发觉，二者速度发展的趋势几乎是一致的，在絕大多数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大一些，工业生产增长的幅度也就大一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小一些，工业生产增长的幅度也就小一些。

这就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这种波浪起伏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經濟的高速度发展，呈現着一种波浪起伏的状态。

因此，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諸因素的变动趋势，对于我們探討和掌握社会經濟高

● 轉引自勒·科茲洛夫“論苏联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指标”經濟譯叢。1959年第6期。

速度发展的波浪式，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知道，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除充分发挥人們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个决定性因素外，不断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或者说，技术的不断进步，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是，技术进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是一个不均衡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

第一，技术的进步需要有强大的、先进的物质基础，要使我们整个国民经济都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用先进的技术代替落后的技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逐步过渡到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这就需要我們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各个不同时期、年度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同，政治经济任务不同，具体的经济情况不同，我們就不可能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年度都拿出同样的力量来进行基本建设，有的时候投资多一些，有的时候就要少一些。更重要的是：劳动技术装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同速度，而更直接的取决于各年新固定资产的动用情况，如果说，各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同速度不可能是均衡的，那么，由于各项建设所需时间长短不同，在不同年度，新固定资产的动用情况就更不是很均衡的。

几年来，我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and 固定资产动用的情况如下：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全部工业投资(亿元)：	16.9	28.4	38.3	43.0	68.20	72.40	173.0
投资增长速度%：	—	+67.8	+35.4	+19.3	+58.8	+6.2	+138.0
新增固定资产(亿元)：	11.3	23.4	28.2	35.3	49.0	64.7	123.7
固定资产增长速度%：	—	+107.0	+20.5	+25.1	+38.8	+32.0	+91.1

上述资料表明：(1)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在各个年度之间，变化幅度是很大的。这样，由于进行基本建设而增加的工业产值在各个年度之间的变化幅度也就是很大的。(2)在各个年度之间，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很不均衡的，在多数情况下，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与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大体一致，但也不尽如此，例如1955年和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都小于1954年，但这两年新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却高于1954年，这是由于，许多基本建设投资是不能在当年就完工投入生产，而有些新固定资产又由于以往投资的结果，这里涉及到建设工期的长短问题。一般地说，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快的年份，新增产值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反之亦然。这样也就势必影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是不均衡的，是波浪式状态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所说固定资产在各个年度增长的速度不同，决不意味着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扩大具有周期性。有人认为：由于我们建设采取“重点投资，分批建设”的方针，就往往使得整个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建设都多少带有“建成一批，再建一批”的情况。换一种说法，就是整个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是具有周期性的。这种意见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把固定资产的动用和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混为一谈了。我們知道，从投资来说，虽然采

● “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48页和第57页。其中增长速度一项系计算得出。

取“重點投資，分批建設”的方針，是“建成一批，再建一批”；但從固定資產的動用來說，由於不同企業建設的時間長短各有不同，不可能同樣是“動用一批，再動用一批”。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之所以錯誤，還在於把社會主義下固定資產擴大的趨勢和資本主義下固定資本更新的趨勢混為一談了，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下“固定資本周期的大規模更新，是資本主義歷史時期內不斷重複的危機周期性的物質基礎。（政治經濟教科書，第三版，人民出版社，第204頁）。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寫道：“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相異的，分散的。但危機往往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所以，就全社會來考察，那又多少是下一個周轉循環的新的物質基礎”（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頁）。很显然，社會主義下固定資產的增長，無論從它的发展趋势和效果來說，與資本主義下有着本質的不同，這種界限萬萬混淆不得的。

第二，技術的進步包括有技術不斷革新的內容在內，但是，技術的革新是有一個過程的，例如，在工業中，一項新技術的發明，試驗，創造到真正運用於生產實踐，總需要有一個過程，有時甚至還是一個很長的过程，而在一項新技術發明創造以後，又會出現更新的技術，技術不斷革新是絕對的。但在技術不斷革新的過程中，在沒有發生質變以前，總是一個量變的過程，而且技術的進步，在不同時期也會有程度的不同，一項重大的技術革新會使生產成倍加番的增長，而每一細小的進步也會對生產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細小的技術進步會經常的存在，而重大的技術革新卻並不是會經常出現的。這樣，必然會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在各種不同年度是不均衡的。

第三，技術的進步還包括有生產者對新技術的掌握和運用的內容在內。技術是需要人去掌握的，最新的技術，如果沒有人去駕駛和運用，它也不會對生產帶來絲毫積極的影響，但是，人們對新技術的掌握，運用到熟練，這也是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尤其是在今天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一項新技術的掌握往往需要有一段相當長的学习時間。由於在不同時期，人們對新技術掌握熟練程度不同，因此，它對生產的影響程度也是不同的，是不均衡的。

從上面所分析的三點，我們可以看出，技術不斷進步是絕對的，但是技術進步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這樣就必然會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年度，是不均衡的，從而也影響生產增長的不均衡性，例如，蘇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為了完成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在1935—1936年，在全國展開了一個以技術革新，打破舊的技術定額為中心的斯達漢諾夫運動，這樣就使1935年勞動生產率增長13%，而1936年更增長21.4%，從而使工業生產在1935年和1936年達到一個新的頂峯，1935年增長23%，1936年則增長29%（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增長19.2%，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增長17.1%）。又例如，我國在1958年，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向自然的大進軍，大興水利，貫徹農業八字憲法，而這些正是農業技術進步的集中表現，這就是我國1958年農業生產獲得了空前大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1958年農業總產值增長25%，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農業生產平均每年只增長4.5%，最高沒有超過7.7%）。

當然，除了技術進步這樣一個重要條件以外，影響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社會分工的進步，勞動組織與生產組織的改進，對勞動資源的分配與利用的改進等等。在這裡，就不準備一一加以分析了。

再次，從農業生產對工業生產的影響來看，在目前我國技術發展水平下，農業生產的發

展，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还比较大，对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还不容易完全控制，这就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尽管说，我们有强大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但它对农业生产增长仍有一定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然灾害的情况。例如1955年是个大丰收年，农业就增长了7.7%，而1954年同1956年，却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全国受灾面积达到全部耕地面积的将近15%，因而农业生产只分别增长了3.3%和4.9%。

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对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直接的影响。例如：（1）在我国轻工业产值中，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部分占80%以上，而轻工业产值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1957年仍占将近一半，在1955年，仅纺织工业一项在整个工业原产值中将近占四分之一。（2）农民出售农付产品的收入，占全社会购买力的46%左右，因此农民收入的多少，就关系到大部分轻工业品和一部分重工业品（如化肥，农药，新式农具等）的销路。（3）在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产值中，农付产品以及以农业原料加工的工业品大约占75%左右，我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器材原料，基本上要靠输出农付产品去换取。这就是说，农业的发展从多方面，包括原料，市场，资金来源等方面来影响工业生产的发展。

从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1952年和1955年农业丰收，1953年和1956年，工业生产就分别增长30.2%和28.24%，1954年和1956年农业遭到灾害歉收，1955年和1957年的工业生产就只分别增长5.57%和11.4%。1956年由于棉花减产，影响1957年棉纱产量比1956年减少60万件，仅此一项，就使1957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降低约2.5%。

从上面的事实就不难看出，由于农业生产对工业生产的密切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前进。

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经济工作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过程中，要使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都能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这就需要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即使在比较深刻的掌握了客观规律性以后，由于人们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计划工作不尽能完全反映客观的情况，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一些难于预料的因素。另外，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所有这些都可能对生产速度有着一些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暂时的，易于克服的，正因为这样，当我们一克服了这些薄弱环节以后，各部门间的配合更为密切，就使各部门各环节间，充分发挥其相互推动、促进作用，使发展速度能更快提高。

总括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趋势呈现着波浪式起伏的状态，这是由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了，而不是由人们主观愿望所规定的。因此，那种认为生产发展的高速度不仅在绝对量上是逐年增长，而且在相对数上（即增长的百分比）也是逐年递增的；或者认为生产发展的高速度虽然在绝对量上是逐年增长而在相对数上却是逐年递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递增论”者一方面在客观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波浪形”的存在，但是，却认为：这种波浪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影响”，只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就可以控制自然，而人为的影响更是可以消除的，因此“波浪形”是可以消灭的，^① 我们认为象自然

① 见1959年8月8日长江日报。

災害這樣的因素也絕不是一個短時期內人們所能完全控制的。這裡主要問題是：“遞增論”者不是從經濟發展過程本身去尋找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而企圖從人們的思想，人們的主觀活動方面去尋找經濟發展過程的規律性，不是對事物本身進行科學的分析，尋找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而是企圖用人的主觀能动性去消滅客觀事物本身存在的規律性，自然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遞減論”者則認為，隨着生產量的逐年加大，生產增長的相對數則會逐年遞減，他們的觀點是建立在“技術不變”這樣一個假定的前提上，列寧批判“土地收益遞減律”時就指出，在生產技術不變的場合，生產的增長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但是，列寧接着着重指出：技術是不斷進步的，因此，土地收益遞減根本就不能成為一個什麼規律，只是在技術不變的場合，它有相對的適用性。[●]我們認為：列寧對土地收益遞減論者的批判，對於生產增長“遞減論”者也是完全適用的。

三

社會主義經濟高速度發展是“波浪式”前進的。但是，這種“波浪式”發展本身又有着怎樣的動態和趨勢呢？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首先，關於波浪的發展趨勢問題。

從長期來考查，從總的發展趨勢來說，波浪的發展，是曲線向上呢？還是曲線向下呢？在這裡，必須區別幾種情況，分別進行考查。

先看看十年來我國工業發展的資料[●]。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工業總產值 (億元)	140.2	191.2	263.5	343.3	447.0	519.7	548.7	703.6	783.9	1170.0	1468.4
環比增長速 度(%)	—	36.4	37.9	30.3	30.2	16.3	5.6	28.2	11.4	66.0	25.5
各年絕對增 長額(億元)	—	51.0	72.3	79.8	103.7	72.7	29.0	154.9	80.3	466.0	298.4

从上表這些數字，可以看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從生產的絕對量來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生產的絕對量是不斷的、一貫地逐年增長的，幾乎可以說是直線上升。從蘇聯1921年至1957年工業生產物量動態指數來看，也說明這點，除衛國戰爭時期由於戰爭影響以外，其他每一年生產的絕對量，都是比前一年的絕對量要大。（參閱勤·科茲洛夫：論蘇聯工業增長速度指標，經濟譯叢，1959年第6期）。

第二種情況是：從生產增長的絕對量來說，如果以年度為單位進行考查，我們就可以看出，絕對增長量並不是逐年遞增或逐年遞減而是有起伏的。以蘇聯1921年至1957年工業生產品增長絕對量來看，也是如此，有些年份絕對增長量較上年絕對增長量減少了，有一些年份的絕對增長量比上一年絕對增長量增加了。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絕對量增長是曲線上升的，

● 見列寧全集第五卷87—90頁

● “偉大的十年”國家統計局編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76—78頁。各年絕對增長額系推算出的。

我国1959年工业总产值就比1949年增长十倍以上，苏联工业生产1955年的绝对增长量也比1929年的绝对增长量大了十多倍。（同上）。其所以有些年度的绝对增长量比上一年减少了，是由于该年的增长速度比上一年降低了，而且降低的幅度还比较大。如果增长速度比上一年稍有降低，绝对增长量不一定会比上一年减少。

如果我们以较长时期（例如说五年）为单位来进行考查，我们就可以看出：绝对增长量还是一贯地上升的：不仅计划期末绝对增长量比计划期初要大得多，而且下一个计划时期绝对增长量的总额也要比上一个计划时期绝对增长量总额要大得多。

第三种情况是：从相对增长量（即增长速度）来看：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很难得出“曲线向上”或“曲线向下”的结论。因为，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它的增长速度不可能是“曲线下降”的，因而生产增长速度的长期趋势，也不可能是“曲线向下”。但是，是否将是“曲线上升”呢？我们知道，生产增长速度，不仅意味着生产的“加快”，而且意味着“加快率”。尽管说社会主义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生产基数加大不会使生产速度递减，但生产基数对速度的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从长期看，“曲线上升”也是有困难的。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例如在我国目前时期，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很可能是“曲线上升”的。比如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已经可以看出会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正如李富春同志所说的：“当然，基数扩大以后，对于速度继续提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就我国目前时期的情况来说，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自然资源，进行技术革新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可估量的雄厚的潜在力量。而且，工农业生产愈发达，物质技术基础愈扩大，这种潜在力量也就会愈大。只要我们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它的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就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跃进的速度，这是确定无疑的”。（李富春：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红旗”1959年第19期）。

如果要从更长时期，来看生产发展速度的“曲线”（波浪式），很可能既不是“向上”，也不是“向下”，而是有时候向上一一点，有时候向下一一点。这就是说，“曲线”（波浪式）发展的本身，也很可能是“波浪式”的。但不管这条曲线的发展趋势怎样，总的说是高速度，是持续的跃进。

要充分论证生产发展速度的长期趋势，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以及影响生产发展速度的各种因素，在将来所发生作用的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的、具体的、深刻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们还很难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其次，关于波浪的幅度变动趋势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的波浪式发展，究竟是采取大波大浪形式还是小波小浪的形式、或者是大波浪夹小波浪的形式呢？如同波浪本身不是由人们主观愿望决定，而是客观经济因素决定一样，波浪的幅度大小也不能由人们来任意规定，它是由决定波浪式发展诸因素自身的变动趋势规定的。

从前面我们关于形成波浪式诸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因素的作用，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将是存在的，而且，其中一些主要因素，其发展都带有由量变到质变的性质，带有大波浪夹小波浪的性质。

例如，從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以前，生產關係每一個重大的變革都標誌着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這種變革必然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極其明顯的影響。我國在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所引起的生產高潮，以及1958年由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引起的史無前例的大躍進，便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

在社會主義革命（包括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以後，生產關係的變革仍然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比如由小集體變為大集體，由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變為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在分配方面由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變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以及生產關係某些個別環節的局部調整，都會帶來生產力飛躍的發展。但是由小集體到大集體，由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這是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而共產主義的因素更是在社會主義內部逐漸產生，發展和成熟的。

再從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和技術進步的因素來看，從一個較短時期觀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可能比較穩定，但從長時期來看，卻不盡如此，隨着整個國民經濟實行全面機械化和自動化，全面的電氣化，全面的化學化和原子能化，都必然會使勞動生產率，從而整個社會生產突飛猛進的增長。而且技術的進步是無止境的，將來技術進步會達到什麼境地是現在很難預料的。當人們第一次使用蒸汽機的時候，他一定沒有想到二百年以後會出現原子動力機械，同樣，我們也很難預料，一百年，二百年以後，生產技術的革新會出現什麼奇蹟，但是可以肯定，生產技術的發展是永無止盡的，新的、重大的技術革新將會永遠不斷的出現，因此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仍然會帶有大波浪夾小波浪的性質。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其中有一些因素，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它對生產的影響作用會帶有相對的均衡的性質。例如，隨着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勝利，隨着農業技術改造（機械化、水利化、電氣化）的逐步實現，自然條件對於農業生產的影響將逐漸減弱，農業增產將趨於穩定，這樣，農業生產對於工業生產的制約作用也將逐漸減弱。又如，隨着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建成，生產力的配置日趨合理，各個部門，各個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會逐步消除，從而使得各個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協作和配合更趨完善。

綜上可知，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都是波浪式前進的，並且具有大波浪與小波浪相交錯的性質。但是在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它是採取大波浪夾小波浪的形式，即大波浪是經常出現的，小波浪是暫時的，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以後，則是採取小波浪夾大波浪的形式，即小波浪是經常出現的，而大波浪是暫時的。

因此我們就不同意這麼兩種看法：一、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大波浪夾小波浪的形式都是一樣的，無差別的，甚至波浪有趨於擴大的趨勢；二、認為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波浪的幅度有越來越小，歸於消滅的趨勢。第一種情況是沒有看到形成波浪式發展的各种因素在不同的時期所起的不同變化，只看到有些因素仍然起作用的一面（中間也有變化），而沒有看到有些因素已起相反變化的一面；第二種看法則是忽視了有些因素在整個過程中都在經常起作用，否定事物仍是按量變到質變的進行，而只是看到有些因素已發生變化的一面，甚至過分強調這變化的一面。因而都具有片面性，不能全面的反映事物運動的規律性。

四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波浪式，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中所出现的波浪式，它只是表明：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中，从各个年度来看，生产增长速度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有的年份高些，有的年份低些。但不管每年增长速度变动的趋势有多大，所出现的是大波大浪还是小波小浪，整个国民经济仍然是高速度发展的，仍然是持续的跃进！

有些人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那么，在出现了一个生产高潮（大跃进）以后，就必然要出现一个生产低潮，甚至认为，这种生产高潮与生产低潮是周期出现的。把国民经济的波浪式发展与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有害的观点，是与总路线的精神相违背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实质上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忽视了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在党的领导下所形成的千百万人的群众运动，而这些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持续跃进的经常的，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要素，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发挥，是推动社会生产迅速跃进的決定力量。但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人民群众发挥自己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广阔的天地。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着党的坚强的正确的领导，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正确的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革命不停顿的进行到底，使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不断的发挥。同时党的正确领导还在于，把党的领导同千百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同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党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一条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貫徹群众路线，把党的领导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确结合起来的路线，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实质就是对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的重视。只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坚决貫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能够把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使之成为经常的，积极的因素，这是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持续跃进的根基本保证。党的领导还在于，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强调政治对经济的首要地位，强调政治挂帅。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政治思想发育同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而以政治为灵魂，为统帅，这样，劳动群众就总是会以经常饱满的革命热情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总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就能够形成和经常的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群众性的运动，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这种群众运动就必然会成为我们经济跃进发展的最积极的，最经常的因素。刘少奇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论证社会主义建設中組織群众运动的问题时指出：“在正确的领导下，这种群众运动一定能够成为推动我们经济跃进发展的最积极的，经常的因素。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集中领导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

起来，把对羣众的政治教育和物質鼓励結合起来，而以政治为灵魂，为統帥。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就能够形成和經常的保持社会主义建設的广大羣众性的运动，最大限度的發揮人民羣众在建設事业中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羣众經常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并且依靠工人，农民和工程技術人員开展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来不断地增加現代化生产工具和发展現代技術在生产中的应用。只要我們这样做，我們国民經济跃进的局面就能够持久地保持下去。这是毫无疑問的”。

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我国在1959年取得了国民經济的連續大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3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39.3%，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16.7%。这一事实雄辯的說明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国民經济跃进局面是能够持久的保持下去的。企图以国民經济发展的波浪式为掩盖，来否定国民經济的持續跃进，否定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这是一种右傾机会主义的观点。

讓我們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毛澤东思想的指导之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使我們的国民經济持續的全面跃进，在不太长的時間內，把我們祖国建設成为一个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59年10月初搞，60年1月修改)